

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入学机会与人力资本积累

——来自异地中考政策的证据

陈媛媛 宋 扬 邹月晴*

内容提要 随着随迁子女教育改革的推进，异地中考政策下子女实际的高中入学情况如何亟待回答。本文计算了2013-2016年72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结合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无论子女随迁或留守，父母流入城市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概率越低。若于2015年在全国取消异地中考限制，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率将提升3.63%，增加12.787万流动人口子女入读高中；这一影响在父母技能水平较低或农村户口家庭中更大。上述结果是由于异地中考门槛抑制了儿童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导致的，异地中考门槛不仅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还降低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经济与时间投入。

关键词 异地中考 流动人口子女 高中入学 人力资本积累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 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电子邮箱：yuchen@mail.shufe.edu.cn；宋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song_yangsysy@163.com；邹月晴（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13886958720@163.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随迁子女升学政策改革的影响评估”（项目编号：722730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评估流动儿童相关教育政策对流动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短期与长期影响”（项目编号：717730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兴技术与消费需求分化冲击下的中国劳动力流动规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项目编号：72034006）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的留守”（项目编号：CXJJ-2022-323）的资助。

战略性支撑”，并特别提到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促使城市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公共教育政策造成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之间教育机会、教育质量、教育成就等产生显性与隐形的差距（吴霓、王学男，2017），尽管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中，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实现随迁子女教育公平仍然任重而道远。

早在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就提出“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的战略目标，至 2020 年，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工作已卓有成效，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 1429.7 万人，有 85.8% 的随迁子女能够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①。相比而言，根据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20 年全国 16 ~ 18 岁儿童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为 71.99%，而 16 ~ 18 岁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为 57.41%，低于全国水平 14.58 个百分点，随迁子女高中升学机会不均等现象仍然严峻^②。高中教育是推进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公平的转折点，但现阶段各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依然无法满足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升学的需求（吴霓、朱富言，2014），很多流动人口家庭因为难以达到异地中考的条件，或让子女继续留在身边但放弃升学，或为了就读高中无奈返乡，成为留守儿童（Koo et al., 2014；吴贾、张俊森，2020）。

可以预见，异地中考政策直接对随迁子女参加中考设限，政策越严苛的城市，随迁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概率会越低，但受政策影响返乡留守子女的升学情况如何，尚难以定论。本文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城市面临的异地中考限制，不仅对随迁儿童有负面影响，对返乡后的留守儿童依然有负面作用。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父母在异地中考门槛相对较高的一线城市流动的留守子女上高中的比例为 78.09%，比父母在三四五线城市流动的留守子女上高中比例低 2.56%，留守儿童父母所在城市异地中考限制越严格，其高中入学率也越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从升学难度较高城市返乡的留守子女入读高中的情况也变差呢？

本文从公共教育政策下教育机会的限制给流动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带来负面影响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难以逾越的入学障碍使流动人口家庭预期到未来“有学上”与

① 参见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ijiaosi/202111/t20211102_577159.html。

② 这里的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需要指出的是，若考虑因异地中考政策提早返乡读书而留守在家的儿童，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城市的高中阶段升学率会更低。

“上好学”困难的存在，直接挫伤了父母与儿童对教育的追求（吴愈晓、黄超，2016）。制度歧视带来的社会外部不公平感也使流动儿童更加自我封闭、情绪低落，学习自我效能感直线下降，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受阻（熊春文、陈辉，2021）。当制度限制导致流动儿童不得不返乡时，更会严重影响这些儿童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杨东平，2017）。因此，教育制度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取更高收入的同时，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表现于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减少，还有学习兴趣下降、性格形成缺陷、社会融入难、未来发展受阻等方面。同时由于城乡环境变迁和教材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流动儿童即便在城市享受到了短暂的优质义务教育，返乡后也难以将其成功转化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张宝歌，2012）。

中国各城市异地中考政策的差异为实证考察升学制度限制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响提供了机会。2012年8月，《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推动各地在年底前制定好随迁子女升学政策，自此各城市出台了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社保缴纳证明、工作证明、住房证明、学生学籍等为辅助依据的异地中考政策。截至2021年，政策覆盖范围已达到预期，除西藏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均公布异地中考方案。但目标达成度尚不满意，政策惠及的流动人口覆盖面较窄，仍有大量适龄青少年被“拒之门外”，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的政策反而强化了限制了流动人口子女可报考的学校（吴霓、朱富言，2014）。同时，异地中考限制在不同城市有明显差异，三四五线城市门槛设置较低甚至允许所有持有居住证的随迁子女就地升学，但是作为流动人口主要输入地的一线城市门槛设置仍然过高，导致政策无法满足大量流动人口子女升学的需求。

本文通过收集2013-2016年全国72个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文件，构建了统一的、可跨区域比较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标体系，并计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从公共教育政策限制、入学机会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三个维度，结合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评估了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子女随迁还是留守，父母流入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其高中入学率均越低，在使用Oster（2019）的无工具变量推断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旧稳健。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若于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异地中考限制，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率将会提升3.63%，能够增加12.787万流动人口子女进入高中学习。异地中考门槛的负面影响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农村户口家庭中更为明显。同时，本文结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进行机制检验发现，异地中考门槛使流动人口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到了阻碍。异地中考限制程度越严格，

流动人口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越差，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对子女的教育经济投入与时间投入越低。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有如下几方面贡献：第一，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利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评估随迁子女相关的教育政策效果的研究亟待补充与完善。已有大批学者针对中国宏观教育政策效果以及政策波及群体的微观福利进行研究，但多数集中在面对所有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政策、撤点并校、高等教育扩招等（吴要武、赵泉，2010；刘生龙等，2016；梁超、王素素，2020），针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的文献也多聚焦于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冯帅章、陈媛媛，2012；Chen et al., 2020）。本文直击随迁子女教育升学政策改革的焦点，具体分析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的影响，全面考虑其对儿童自身人力资本发展及其家长教育参与的影响，弥补了流动人口子女升学政策研究的缺失。同时，相较于既有文献仅聚焦于随迁子女（吕慈仙，2018；陈宣霖，2021），本文同时关注了留守儿童，更为全面地审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可能影响。

第二，异地中考政策作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问题的针对性举措，研究现有政策下的流动人口子女实际高中入学情况十分必要。异地中考政策自2012年底推行后已持续多年，绝大多数研究只落脚于文本政策的梳理（吴霓、朱富言，2014；张银锋，2018），仅有李红娟和宁颖丹（2020）依据60个城市的政策条例制定了系统的异地中考门槛量化指标体系，但并未对不同年份的政策做区分且尚未实证探究政策的具体效果。本文通过重构异地中考门槛指标体系，计算2013-2016年72个城区人口100万以上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对异地中考政策利益直接相关者——流动人口子女及家长的心理状态与微观行为变化予以严谨的实证分析，有利于准确全面地评价中国的异地中考政策效果。

第三，教育公平在当今教育公共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关于教育机会增加对教育不平等影响的文献已有很多，部分学者认为扩招会缩小教育差距（刘精明，2006；张兆曙、陈奇，2013），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扩招的同时也存在着机会分配的不公平问题，研究结论尚不统一（李春玲，2010；吴愈晓，2013）。本文从教育机会限制对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视角，以异地中考政策为例，发现升学限制更加强化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尤其影响了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农村户口家庭子女接受高中教育，呼吁加快流入地城市异地中考政策的改革进程。

第四，明确异地中考政策与流动人口子女实际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对理解现有教育政策解决教育不公平的有效性，更好更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经济增长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时代新经济发展模式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作用更加举足轻重。优质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是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李政涛、周颖，2022），也是高效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壮大高质量中等收入群体，尽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依据。

二 理论分析

影响教育产出的因素包括学生和家庭等微观层面的特征，如学生的个体特征与经历、父母学历、父母迁移经历、家庭教育投入、老师和学校特征等（Sandefur et al., 2006; Clark & Bono, 2016; Meng & Yamauchi, 2017; Wu et al., 2019; Blandin & Herrington, 2022），也包括宏观层面和政策的因素，如城市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政策和教育体制等（刘精明，2006；李春玲，2010；陈宣霖，2021；Stuart, 2022）。异地中考政策以家长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参考家长的社保缴纳证明、工作证明、住房证明以及学生学籍等条件作为流动人口子女参加中考的门槛，导致很多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在流入城市参加中考。在异地中考政策的限制下，面对子女在流入城市无书可读的现实困境，部分流动人口会选择让子女提前返乡成为留守儿童（魏东霞、谌新民，2018），在户籍地参加中考；也有部分流动人口在权衡子女留守的负面效应以及家庭化迁移所带来的收益后，选择让子女留在自己的身边，或努力争取满足异地中考要求，或放弃升学。

从留守子女的角度来看，子女回到家乡后没有任何的升学限制，其能否升入高中主要是由学生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决定的。但已有研究发现，子女在跟随父母流动时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制度歧视带来的社会外部不公平感使流动儿童更加自我封闭、抑郁，学习自我效能感直线下降，阻碍了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熊春文、陈辉，2021）；难以逾越的入学障碍直接挫伤了父母与儿童对教育的期望和追求（吴愈晓、黄超，2016）；当流动儿童由于制度限制不得不返乡时，他们的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将受到严重影响，非认知能力严重受损（杨东平，2017）。同时，教材版本、教学方式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也难以让在城市享受过短期高质量教育的儿童，在家乡顺利发挥出原有的经验与自身优势（张宝歌，2012）。因此，子女在跟随父母流动时，人力资本积累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回乡后，即使可以正常参加中考，很多也难以通过自身实力考入高中。

而对于随迁子女，在现有的异地中考门槛约束下，流动人口子女需满足重重条件才得以在流入城市参加中考，进而升入高中，因此异地中考门槛给他们的高中升学机

会带来了直接的阻碍。同时，与留守儿童相同，制度歧视带来的社会外部不公平感与预期难以逾越的入学障碍均可能抑制随迁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儿童的学业表现和教育抱负，也进一步降低他们升学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无论随迁还是留守，高中阶段的入学率都越低。

假说 2：异地中考门槛可能通过阻碍流动人口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阶段入学率。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以下简称 CMDS）。由于各地在 2012 年年底才出台详细的异地中考方案，本文将样本限定为在 2013 - 2016 年处于中考年龄且父母之后未再流动的流动人口子女^①。由于 CMDS 数据没有流动人口曾经流入城市的完整回溯信息，如果父母在子女中考后流动则无法衡量子女中考时面临的异地中考门槛，因此本文仅保留流动人口“本次流动年份”在子女中考年份之前的样本，这时可以使用父母现在的流入城市衡量影响子女高中升学时面临的异地中考门槛。本文还剔除已离婚或丧偶的样本，最终得到 7134 个家庭样本^②。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每个子女为一个样本，被解释变量是子女是否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虚拟变量，即是否上高中，当子女受教育年限大于 9 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CMDS 数据没有区分高中类别，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等^③。

① 子女中考的年份根据子女出生的年份和月份推算。

② 使用 2013 - 2017 年的 CMDS 数据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只是使用多年数据存在样本重复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汇报 2017 年数据的分析结果。

③ 考虑到部分样本所上的中等职业学校并不需要参加本地中考，本文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异地中考的影响。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子女参加中考年份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为评估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的异地中考政策的难易程度，需要构建一个可统一量化的指标体系。异地中考政策有材料准入制和积分制两种，但归根结底都规定了随迁子女能报名参加中考的最低条件，落脚于对随迁子女与其父母所具备条件的考量。

例如，北京市异地中考政策属于材料准入制，对考生的要求是“拥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对家长的要求是“持有北京市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3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已满3年”。相比而言，西安市同属材料准入制，但要求低很多：对考生的要求是“在我市初中学校毕业”，没有就读年限限制，对家长的要求仅有“父母一方持有本省居住证1年以上、在本省缴纳养老保险1年以上”且对拥有材料时长要求较低。上海市是唯一一个设置积分制异地中考政策的城市，对考生要求“持有本市居住证的应届初三学生或18周岁以下本市往届初中毕业生”，对家长要求“父母一方持有效期内本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120分”，通过计算累计达到标准分值所需的最低条件，我们也可以将积分制转化为材料准入制进行计算。

此外，北京、天津、石家庄等都对随迁子女可选择报考的学校类型进行了限制，这种一刀切的政策限制直接阻碍随迁子女在父母务工地就读公办普通高中，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难度。因此，本文以随迁子女能报名参加中考的身份限制的最低条件为计算基础，融合报考学校限制，构建异地中考门槛指标，综合反映一个城市中随迁子女参加异地中考的难度。

本文具体使用熵值法（Entropy Weight Method，简称EWM）计算异地中考门槛指数（李虹、邹庆，2018；Li et al., 2021）。首先，对2013-2016年72个城区人口在100万以上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文件进行整理，将所需材料归纳为9大类，分别为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合法职业、稳定住所、社会保险、本地学籍、其他证明以及报考学校限制，构建异地中考门槛指标体系，并在每个指标内根据材料和年限要求赋分^①；

① 对于身份证和户口本，将需要赋分为1；居住证、本地学籍、合法职业、稳定住所和社会保险，将需要赋分为1，需要一年赋分为2，需要两年赋分为3，需要三年及以上赋分为4；其他证明，将需要出生证、预防接种证、计划生育证赋分为1，需要原籍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外出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信赋分为2，需要回原籍报考确有困难书面证明赋分为3；报考学校限制，将允许外地子女报考公办普高、但有其他特殊限制赋分为1，不能报考重点高中赋分为2，不能报考公办普高赋分为3。

然后，对 9 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将每个城市各指标的标准化得分与指标权重进行相乘并加总，得到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考虑到流动人口多集中在大城市，本文计算出 72 个城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上城市 2013 - 2016 年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3 - 2016 年期间，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平均得分为 0.223，标准差为 0.136，其中北京市分数最高，为 0.633，合肥市分数最低，为 0.028。

从区域分布上看，全国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异地中考门槛差距较大。如图 1 所示，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进行划分，一线城市流动人口多，教育资源紧张，异地中考门槛最高，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门槛难度近似，异地中考门槛较高，其他城市异地中考门槛较低。表 1 展示了部分城市 2013 - 2016 年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的均值。总体上看，“北上广深”、天津、成都、杭州等经济发达且流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比较高。这些城市是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随迁子女的涌入致使这些城市教育资源供需失衡，原有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为保护本地居民的入学权利，教育资源较好的城市也会设置更高的异地中考门槛。表 2 相关性分析显示异地中考门槛与城市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情况正相关，其与普通高等学校数、985 高校数和 211 高校数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异地中考门槛的设定主要是对本地户籍居民高等教育机会的保护，有限制外来移民，维护本地儿童升学权利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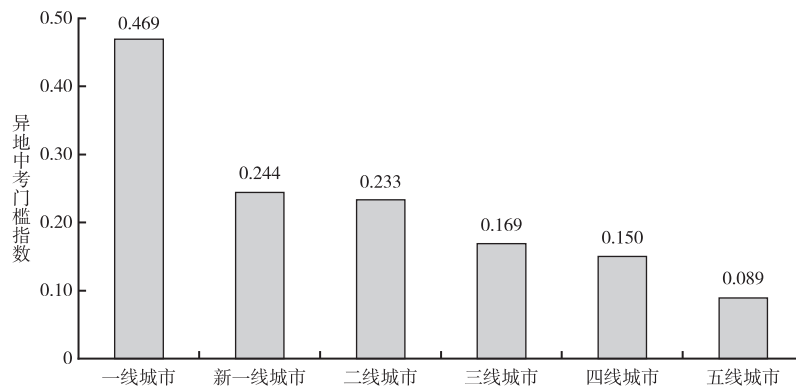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城市类型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绘制得到。

表 1 部分城市 2013–2016 年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均值

城市	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城市	异地中考门槛指数
北京	0.633	重庆	0.286
天津	0.589	南京	0.255
上海	0.495	南宁	0.187
成都	0.412	海口	0.181
深圳	0.392	烟台	0.172
杭州	0.286	西安	0.120
广州	0.357	鞍山	0.108
济南	0.319	武汉	0.056
兰州	0.294	合肥	0.028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计算得到。

表 2 异地中考门槛与城市层面因素相关性分析

变量	异地中考门槛	常住人口	人均 GDP	城镇登记失业率	商品房销售价格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职工平均工资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985 院校数量	211 院校数量	普通中学学校数量
异地中考门槛	1.000										
常住人口	0.325 ***	1.000									
人均 GDP	0.331 ***	0.288 **	1.000								
城镇登记失业率	-0.224 *	-0.226 *	-0.381 ***	1.000							
商品房销售价格	0.529 ***	0.458 ***	0.640 ***	-0.437 ***	1.000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0.391 ***	0.164	0.349 ***	-0.246 **	0.545 ***	1.000					
职工平均工资	0.476 ***	0.358 ***	0.503 ***	-0.140	0.658 ***	0.495 ***	1.000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0.266 **	0.354 ***	0.298 **	0.202 *	0.288 **	0.382 ***	0.570 ***	1.000			
985 院校数量	0.400 ***	0.480 ***	0.333 ***	-0.151	0.452 ***	0.465 ***	0.542 ***	0.414 ***	1.000		
211 院校数量	0.247 **	0.547 ***	0.350 ***	-0.105	0.441 ***	0.465 ***	0.502 ***	0.428 ***	0.892 ***	1.000	
普通中学学校数量	0.235 **	0.546 ***	-0.019	0.179	0.175	0.287 **	0.428 ***	0.525 ***	0.345 ***	0.358 ***	1.000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3. 相关控制变量

由于子女教育的决策与父母技能、家庭经济情况等均有关，本文的控制变量分为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两类。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子女、受访者和配偶特征变量。子女特征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和个数；受访者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受教育年限、流入所在城市年限、是否有医疗保险以及家庭月收入；配偶特征包括配偶是否随迁、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和受教育年限。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常住人口、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商品房销售价格、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和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三) 数据描述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各城市异地中考门槛指数与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率的散点图与拟合线。从整体上看，无论是随迁子女还是留守子女，父母流入地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子女的高中阶段入学率均越低。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上高中 (是 = 1)	0.755	0.430	0	1
核心解释变量	异地中考门槛	0.303	0.170	0.028	0.633
控制变量	子女性别 (男 = 1)	0.567	0.496	0	1
	子女年龄	17.640	1.191	16	20
	子女民族 (汉族 = 1)	0.946	0.227	0	1
	子女户口性质 (农村户口 = 1)	0.808	0.394	0	1
	子女个数	1.782	0.697	1	6
	受访者性别 (男 = 1)	0.535	0.499	0	1
	受访者年龄	43.370	3.753	25	60
	受访者民族 (汉族 = 1)	0.945	0.227	0	1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8.737	2.754	0	19
	受访者户口性质 (农村户口 = 1)	0.836	0.371	0	1
	流入所在城市年限	10.330	6.616	1	43
	受访者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 = 1)	0.933	0.250	0	1
	配偶是否随迁 (是 = 1)	0.882	0.322	0	1
配偶年龄	43.320	3.910	25	71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配偶民族 (汉族 = 1)	0.947	0.223	0	1
	配偶受教育年限	8.828	2.551	0	19
	配偶户口性质 (农村户口 = 1)	0.818	0.386	0	1
	家庭月收入 (元)	7563	5928	0	1200000
	常住人口 (万人)	762.577	479.734	207.100	3048.43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72970.760	30693.240	16538.200	167411
	职工平均工资 (元)	59147.200	13302.580	36097.700	122749
	商品房销售价格 (元/平方米)	7712.697	4851.835	3103.000	45497.890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47.052	12.374	16.570	81.030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46.913	10.706	16.440	80.23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2.962	0.798	1.200	4.500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个)	24.035	23.158	1	91
个体样本量		7134			
城市样本量		288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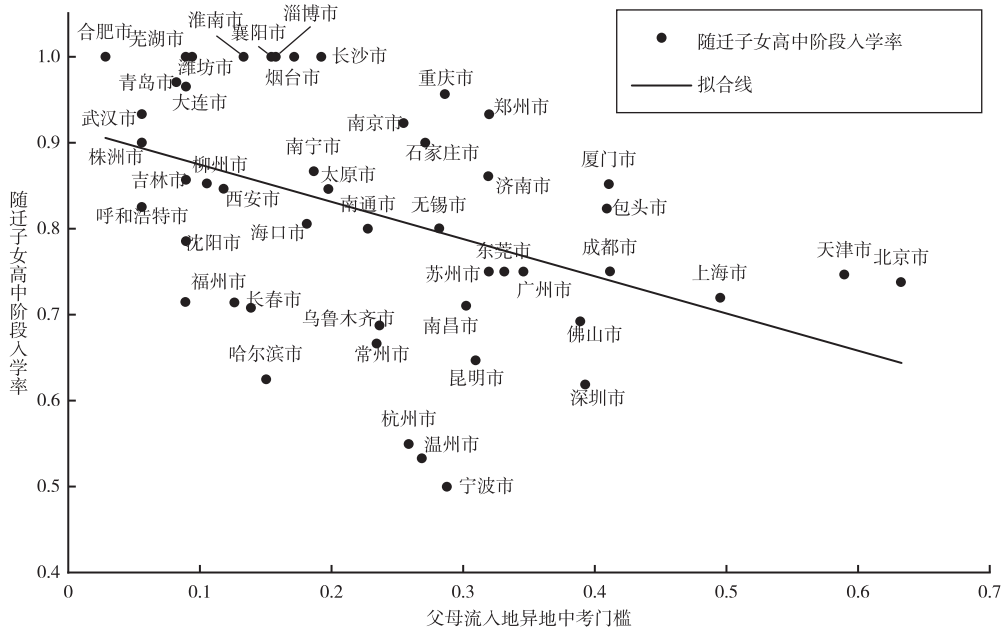


图 2 城市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率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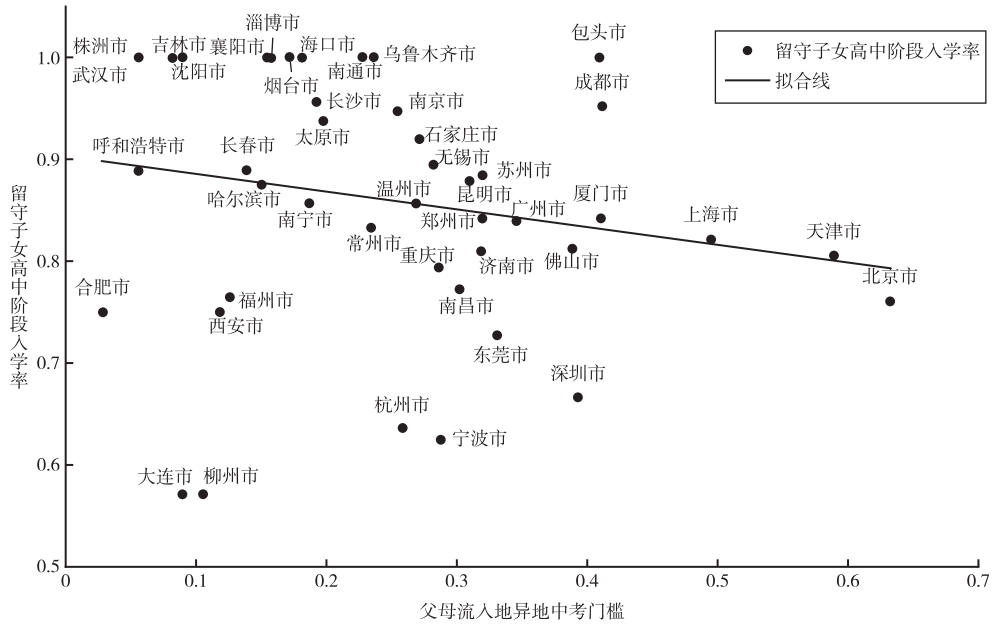


图 3 城市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留守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率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考察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的影响，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的基准回归方程如式 (1)：

$$P(\text{highschool}_{icht} = 1) = \partial_0 + \partial_1 \text{threshold}_{ct} + \partial_2 X_{icht} + \partial_3 Z_{ct} + c_h + \delta_t + u_{icht} \quad (1)$$

其中，下标 i 表示子女， c 表示流入城市， h 表示户籍所在省份， t 表示流动人口子女参加中考的年份。 highschool_{icht} 表示子女是否进入高中阶段学习， threshold_{ct} 是子女参加中考年份 t 时父母流入城市 c 的异地中考门槛，系数 ∂_1 表示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的影响， ∂_1 为负表示异地中考门槛提高会降低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阶段入学概率。 X_{icht} 为家庭层面特征变量， Z_{ct} 为子女参加中考年份 t 时城市 c 的特征变量。模型加入了流动人口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c_h 和子女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δ_t ，使用流入城市的聚类标准误。

四 主要实证结果

(一) 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的基准回归

表4前5列汇报了模型(1) Probit估计的边际效应^①。第(1)列只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第(2)列至第(3)列逐步加入了户籍所在省份和中考年份固定效应,各列中异地中考门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第(3)列结果表明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异地中考门槛每增加1个单位,子女上高中的概率减少16.2%。总体上看,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上高中概率越低。第(4)列至第(5)列分别估计了异地中考门槛对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是否上高中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城市异地中考门槛增加1个单位,留守子女上高中的概率减少14.1%,随迁子女上高中的概率减少20.2%。无论子女是留守还是随迁,他们的高中入学都受到了异地中考门槛的负面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异地中考门槛除了直接减少随迁子女高中入学的机会外,还同时增加其返乡留守的可能性。实际上,当流动人口子女面临异地中考问题时,有随迁上高中、随迁不上高中、留守上高中和留守不上高中四种选择。为了综合考虑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和升学决策的影响,第(6)列至第(8)列使用多元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以下简称MLogit),以随迁上高中作为基准组,估计异地中考门槛对其他三种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随迁不上高中、留守上高中、留守不上高中的胜算比均为正数,分别为1.292、1.902和2.816,表明异地中考门槛上升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放弃高中入学的概率增加,同时留守的概率增加更大,且在留守子女中不上高中的概率增加更多。从这一点来看,流动人口进入高门槛城市务工时,是以牺牲子女教育为“流动的代价”。

根据表4第(3)列的结果,若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以计算的72个城市2015年的异地中考门槛均值0.224近似为全国所有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均值,进行粗略测算,若于2015年在全国取消异地中考限制,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率将提升 $0.224 \times 0.162 = 3.63\%$,增加 $1.030 \text{亿} \times 3.42\% \times 3.63\% = 12.787 \text{万}$ 流动人口子女进入高中学习^②。以社保为例,若城市异地中考限制中父母单方社会保险年限要求降低一

① 采用最小二乘模型的估计结果与Probit模型一致。

②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为1.030亿;依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九年级子女占比为3.42%。

年，相当于城市异地中考门槛降低了 $0.125 \times 0.211 = 0.026$ ^①，则流动人口子女上高中的比例会提高 $0.162 \times 0.026 = 0.42\%$ 。

表 4 异地中考门槛与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基准回归

因变量：上高中	(1)	(2)	(3)	(4)	(5)	(6)	(7)	(8)
	Probit 估计					MLogit 估计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留守子女	随迁子女	随迁不上高中	留守上高中	留守不上高中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128 * (0.070)	-0.152 ** (0.068)	-0.162 ** (0.063)	-0.141 ** (0.055)	-0.202 ** (0.091)	1.292 ** (0.550)	1.902 *** (0.548)	2.816 *** (0.696)
样本数	7134	7134	7134	3110	3998	7134	7134	7134
Pseudo R ²	0.101	0.114	0.127	0.126	0.149	0.151	0.151	0.151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	—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MLogit 的基准组为随迁上高中，汇报的回归系数是相对于基准组发生概率比值的对数。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二) 内生性分析

异地中考门槛的设置与城市的诸多特征有关，这些特征也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上高中的决策，尽管基准模型中控制了流入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活成本、就业状况、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等相关变量，但依然存在如城市生活环境等不可观测因素，可能造成估计的偏误。对此，本文使用 Oster (2019) 的边界方法来检验估计结果在是否稳健。

参照 Oster (2019) 的检验思路：第一，设定不可观测变量和可观测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δ 为 1，将模型拟合优度提高到 $R_{max} = 1.3R$ ，如果偏差调整后的回归系数 β^*

① 社会保险指标的标准化赋分为 0.125，指标权重为 0.211。

仍显著不为 0，则通过检验。第二，假设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β 为 0，放大模型的拟合系数 $R_{max} = 1.3R$ ，计算不可观测变量和可观测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δ 。如果得到 δ 的绝对值超过 1，表示结果稳健。表 5 显示，偏差调整后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且 δ 估计值大于 1，这表明遗漏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不足以影响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Oster 边界方法的遗漏变量偏误检验结果

因变量：上高中	(1)	(2)
	设定不可观测变量和可观测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 δ 为 1	假设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β 为 0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177 ** (0.089)	2.464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和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标的计算方法

基准回归中使用了基于熵值法构建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表 6 分别使用因子分析法（尹志超等，2014）、等权重法和投影寻踪法（张吉鹏、卢冲，2019）测算异地中考门槛，发现异地中考门槛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结果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更换异地中考门槛指数计算方法

因变量：上高中	(1)	(2)	(3)
	因子分析法	等权重法	投影寻踪法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049 ** (0.023)	-0.291 ** (0.124)	-0.099 * (0.055)
样本数	7134	7134	7134
Pseudo R ²	0.126	0.127	0.126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和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2. 排除家长流入时间的影响

随着家长在流入城市务工时间的增加，其社会资本积累也不断增加，可能有助于帮助子女跨越异地中考政策的阻碍。表 7 分别使用在流入城市时间超过 2 年、3 年、4 年和 5 年的样本进行回归，各列结果均与基准模型一致，且异地中考门槛的回归系数在组间差异不大，表明在流入地的时间长短与满足异地中考门槛的概率相关性不强。可能的原因是，异地中考政策主要对缴纳社会保险等条件有年限限制，对在本地的时长没有限制，而流入时间长并不代表其在本地缴纳社保等时间长。2017 年 CMDS 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流动人口缴纳社保和流入年限相关系数仅为 0.008。

表 7 稳健性检验：排除家长流入时间的影响

因变量：上高中	(1)	(2)	(3)	(4)
	流入时间 ≥ 2	流入时间 ≥ 3	流入时间 ≥ 4	流入时间 ≥ 5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172 *** (0.063)	-0.167 *** (0.061)	-0.176 *** (0.061)	-0.158 ** (0.061)
样本数	6916	6573	6156	5608
Pseudo R ²	0.127	0.127	0.128	0.126

注：*、**、***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和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3. 考虑未跨市流动的样本

基准回归中仅包括跨市流动的人口，而市内跨县流动的人口，不会受到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如果本文基准结果反映的只是城市其他特征导致的结果，那么在这部分样本中，异地中考门槛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 8 第 (1) 列至第 (3) 列展示了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异地中考门槛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本文的结果并不是城市层面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市内跨县人口没有受到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他们的门槛指数可设为 0，第 (4) 列至第 (6) 列在基准样本的基础上加入市内跨县流动的样本，结果仍然稳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CMDS 只包括正在城市流动的人口，因此本文估计的是给定现有流动人口的影响，并不是政策变化导致人口流动带来的一般均衡效应。

表 8 稳健性检验：考虑未跨市流动的样本

因变量：上高中	(1)	(2)	(3)	(4)	(5)	(6)
	安慰剂检验：仅包括市内跨县流动的人口			同时包括市内跨县和跨市流动的人口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013 (0.123)	0.065 (0.139)	0.093 (0.143)	-0.122 ** (0.048)	-0.108 ** (0.044)	-0.109 *** (0.042)
样本数	1359	1359	1359	8493	8489	8489
Pseudo R ²	0.106	0.121	0.126	0.101	0.114	0.124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	是	是	—	是	是
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	—	是	—	—	是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四) 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异地中考政策设置的条件往往具有技能偏向的特征，如对稳定住所、合法职业或者缴纳社会保险等有相应的要求。表 9 展示了按照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父母户口类型和家庭收入位于流入城市当年百分位数分组的回归结果^①，均证实了异地中考门槛的技能偏向型特征。

在教育分组中，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高中入学受异地中考门槛的影响越小，当父母平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时，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高中入学的影响不显著。在城市和农村户口的分组中，异地中考门槛只对农村户口家庭子女入读高中有显著影响。从收入上看，当家庭月收入越低时，异地中考门槛对子女上高中的负面影响越大，只有当家庭平均月收入高于当年该城市流动人口家庭收入 60% 的百分位点时，异地中考门槛对其子女高中入学才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异地中考门槛与落户门槛、义务教育入学门槛相似，技能偏向性特征十分明显，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改善和教育机会的获得（魏东霞、谌新民，2018；杨娟、宁静馨，2019）。高技能人才家庭往往更容易满足异地中考政策所需的条件，也有更强的经济能力承担子女教育支出；低技能家庭子女更容易因升学机会减少选择打工谋生。因此，异地中考门槛导致教育机会更多地向家庭背景更优越的流动人口子女倾斜，降低了教育代际流动性。

^① 当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是城镇户口时被识别为城镇户口家庭。

表 9 技能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 上高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按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组			按户口类型分组		按家庭收入分组				
	≤6	6~9	>9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20%以下	20%~40%	40%~60%	60%~80%	80%以上
子女中考当年父母流入地的异地中考门槛	-0.291*** (0.113)	-0.167** (0.076)	-0.063 (0.072)	-0.204*** (0.063)	0.039 (0.089)	-0.423*** (0.142)	-0.255*** (0.083)	-0.180* (0.104)	-0.035 (0.072)	-0.071 (0.087)
样本数	1148	4253	1725	5645	1486	1069	1226	1448	1600	1752
Pseudo R ²	0.085	0.102	0.169	0.122	0.147	0.163	0.126	0.154	0.157	0.180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控制了家庭和流入城市特征变量、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和中考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 2013-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五 异地中考限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为进一步检验异地中考门槛导致流动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入学率降低的影响机制是否成立，本部分将从公共教育政策下教育机会的限制可能降低流动人口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影响机制的探讨，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多维研究视角，具体验证异地中考限制对儿童认知、非认知能力形成与家庭教育的作用，有效识别教育政策限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一) 异地中考限制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在传统人力资本的研究中，能力被片面理解为认知能力，即学习、研究、理解、概括、分析的能力。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认知能力无关的自信心、好奇心、情绪稳定性、责任心、风险承受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也成为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重点。早期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将深刻地影响个体成功的可能性 (Heckman et al., 2006; Cunha et al., 2010)。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低年级时拥有更高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能力的学生在未来会容易接受更程度的教育，并且顺利完成学业 (Rosenbaum, 2001; Lleras, 2008)；针对中国流动儿童的研究也验证了小学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影响其高中的入学率 (Chen et al., 2020)。

我们首先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以下简称 CEPS）2013 - 2014 学年基线调查数据，检验异地中考限制对随迁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①。参考已有文献，本文使用认知能力得分和语文、数学、英语成绩衡量认知能力（殷戈等，2020），非认知能力使用思维开通性、消极情绪性、自律性和社会性 4 类变量衡量（龚欣、李贞义，2018；郑力，2020），具体构建方式如表 10 所示。为使各个指标具有可比性，本文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进行标准化处理，使之成为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标准变量，然后对每类变量中问题的回答取平均值，获得各个非认知能力变量的得分。由于无法得知学生所在的具体城市，我们不能直接使用上文计算的异地中考门槛来衡量城市的异地中考难度，这里使用家长问卷中“按照当地政策，孩子能否在本市报考高中”衡量所在地的异地中考限制，该题项含有 4 个答案，包括“可以报考重点高中”、“只能报考普通高中，不能报考重点高中”、“重点和普通高中都不能报考”以及“不知道”。我们剔除了回答不知道的样本，在模型中加入两个虚拟变量以区分报考难度。具体模型设定如式（2）：

$$human_capital_{isp} = \beta_0 + \beta_1 restriction1_{isp} + \beta_2 restriction2_{isp} + \beta_3 X_{isp} + \delta_s + u_{isp} \quad (2)$$

其中，下标 i 表示学生， s 表示学校， p 表示班级。被解释变量 $human_capital_{isp}$ 是学生 i 的人力资本水平（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当家长回答“只能报考普通高中，不能报考重点高中”时， $restriction1_{isp}$ 取 1， $restriction2_{isp}$ 取 0，当家长回答“重点和普通高中都不能报考”时， $restriction1_{isp}$ 取 0， $restriction2_{isp}$ 取 1。 X_{isp} 表示家庭和班级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学生性别、年级、民族、家庭子女个数和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班级特征变量包括班主任年龄、教龄、性别、班级学生数、班级性别比、班级本县（区）户口学生比例和班级农村户口学生比例。 δ_s 为学校固定效应， u_{isp} 是随机误差项，使用班级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 10 非认知能力变量与题项

变量	问题	回答与赋分
思维开通性	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完全不同意 = 1，不太同意 = 2， 比较同意 = 3，完全同意 = 4
	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	
	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	

^① 在 CEPS 数据中，只有在户籍地以外的儿童才会回答有关异地中考难度的问题。使用随迁子女样本仍可以进行影响机制的检验，因为子女随迁和留守的状态是动态变化的，在随迁时异地中考门槛给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将影响后期儿童留守之后的高中入学率。

续表

变量	问题	回答与赋分
消极情绪性	在过去的七天内, 你是否感觉沮丧	从不 = 1, 很少 = 2, 有时 = 3, 经常 = 4, 总是 = 5
	在过去的七天内, 你是否感觉不快乐	
	在过去的七天内, 你是否感觉悲伤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在这个学校里感到很无聊	
不自律性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经常迟到	完全不同意 = 1, 不太同意 = 2, 比较同意 = 3, 完全同意 = 4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经常逃课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班主任老师经常批评我	
社会性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班主任老师经常表扬我	完全不同意 = 1, 不太同意 = 2, 比较同意 = 3, 完全同意 = 4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的活动	
	关于学校生活, 你是否同意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资料来源: 根据 2013 - 2014 学年 CEPS 基线调查数据整理得到。

表 11 和表 12 分别报告了异地中考限制对儿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的限制与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都不能报考的限制会降低儿童的认知能力水平;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的限制对儿童的社会性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见, 制度性障碍带来的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使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存在重重阻碍, 加剧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困难。

表 11 异地中考限制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因变量	(1)	(2)	(3)	(4)
	认知能力标准化得分	标准化语文成绩	标准化数学成绩	标准化英语成绩
只能报考普通高中,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	-0.170 *** (0.055)	-3.027 *** (0.655)	-2.403 *** (0.779)	-1.810 ** (0.732)
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都不能报考	-0.115 (0.073)	-2.736 *** (0.891)	-2.426 *** (0.837)	-1.644 * (0.924)
样本数	1451	1402	1400	1394
R ²	0.314	0.240	0.133	0.221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各列均控制了家庭与班级特征变量和学校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3 - 2014 学年 CEPS 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12 异地中考限制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因变量	(1)	(2)	(3)	(4)
	思维开通性	消极情绪性	不自律性	社会性
只能报考普通高中，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	-0.094 (0.062)	0.092 (0.057)	0.088 (0.058)	-0.176 *** (0.051)
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 都不能报考	-0.114 (0.081)	0.116 (0.077)	0.079 (0.067)	-0.028 (0.080)
样本数	1380	1403	1439	1411
R ²	0.120	0.135	0.081	0.152

注：*、**、***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各列均控制了家庭与班级特征变量和学校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3 - 2014 学年 CEPS 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异地中考限制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家庭是儿童接受教育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场所，这种教育长期、全面、渗透性强，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子女的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等 (Cunha et al., 2010)。在孩子还未到中考年龄时，流动儿童父母预期到以现有的家庭条件，子女未来难以在大城市获得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直接挫伤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追求，降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家长对子女教育关注度的降低也在潜移默化中挫伤了子女的积极情绪，使子女的成长环境处于弱势。青春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节点，儿童将这些细微变化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模式，影响着个体未来的成就 (Borghans et al., 2008)。为此，我们进一步验证异地中考门槛对家庭教育的影响，具体使用家庭教育期望与家庭教育投入两方面指标度量父母对子女教育态度上的变化。

其中，家庭教育期望使用 CEPS 数据家长问卷中“您希望孩子书最高读到什么程度”和“您对这个孩子的成绩有些什么要求”两个问题衡量。关于家庭教育投入，我们使用 CEPS 数据家长问卷中“您平均每天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生活照料、学习辅导、娱乐玩耍）”和“本学期，孩子上校外辅导班或学习兴趣班每学期所需要的费用”分别衡量时间与经济投入。表 13 的结果显示，不能报考重点高中的限制与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都不能报考的限制均会降低流动人口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成绩要求，同时也减少家长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和对孩子课外教育支出。

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升学制度的限制明显挫伤了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降低了家庭对子女的时间和经济投入。结合已有研究，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降低和教育投入的下降对子女的学业生活有负面效应，降低了子女后续的受教育程度 (张雪、

张磊, 2017; 方超、黄斌, 2019; Blandin & Herrington, 2022)。这意味着异地中考限制确实会通过降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和经济与时间投入这一渠道, 阻碍流动人口子女的高中入学。这一结果的出现将加剧处境不利家庭的教育累积劣势, 拉大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教育“鸿沟”。

表 13 异地中考限制对家庭教育期望和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	(1)	(2)	(3)	(4)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家长对子女的成绩期望	时间投入	经济投入
只能报考普通高中, 不能报考重点高中	-0.635 *** (0.172)	-0.589 *** (0.152)	-0.383 (0.481)	-0.561 ** (0.258)
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都不能报考	-0.331 (0.208)	-0.658 *** (0.170)	-1.191 ** (0.546)	-0.339 (0.337)
样本数	1442	1435	1451	1434
R ²	0.070	0.057	0.088	0.250

注: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各列均控制了家庭与班级特征变量和学校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2013 - 2016 年 72 个城市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3 - 2014 学年 CEPS 基线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

本文考察了针对随迁子女升学的异地中考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高中入学机会, 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利用本文构建的异地中考门槛指数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 在异地中考门槛越高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 无论随迁或者留守, 其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概率均越低, 这一结果在使用 Oster (2019) 的无工具变量推断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此外, 升学政策的限制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 父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 以及农村户口家庭的子女高中入学受异地中考门槛影响更大。本文还使用 CEPS 数据分析异地中考门槛对流动人口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当异地中考门槛上升时, 儿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父母教育期望下降, 并且减少了对子女教育的时间与经济投入。

当前, 国情民情发生深刻变化, 对教育事业的战略定位、历史使命和目标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要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促进教育公平,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的研究发现, 现有的城市异地中考的门槛与国家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目标有所偏离。随迁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是希望能够接受优质的教育，以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原有阶级地位。但以父母工作、住房、社保缴纳证明等为依据的异地中考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低技能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机会，阻碍了教育在助力代际流动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放宽是保障未来城市劳动力质量提升和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应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加快放宽异地中考限制的改革进程，将随迁子女纳入教育规划，建立以城市常住人口为基数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精准定位政策帮扶群体，增加学位供给，扩大异地中考政策惠及面，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升学难的根本问题。第二，淡化异地中考政策制定的技能偏向性，建立以居住年限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异地中考政策，使得不同技能水平的流动人口子女获得的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第三，在推动异地中考政策改革的同时，破除有碍于流动人口子女公平享有教育权利的樊篱，保护流动儿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让所有流动人口子女怀着健康的心态在城市中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 陈宣霖 (2021), 《异地中考政策促进随迁子女选择高中教育吗》, 《复旦教育论坛》第 1 期, 第 75 - 81 页。
- 方超、黄斌 (2019), 《非认知能力、家庭教育期望与子代学业成绩——基于 CEPS 追踪数据的经验分析》, 《全球教育展望》第 1 期, 第 55 - 70 页。
- 冯帅章、陈媛媛 (2012), 《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的教育——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 (季刊)》第 4 期, 第 1455 - 1476 页。
- 龚欣、李贞义 (2018), 《学前教育经历对初中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 CEPS 的实证研究》, 《教育与经济》第 4 期, 第 37 - 45 页。
- 李春玲 (2010),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第 82 - 113 页。
- 李红娟、宁颖丹 (2020), 《异地中考政策的区域差异及思考——基于 60 个城市的政策文本分析》, 《教育测量与评价》第 1 期, 第 29 - 34 页。
- 李虹、邹庆 (2018),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城市产业转型研究——基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对比分析》, 《经济研究》第 11 期, 第 182 - 198 页。

- 李政涛、周颖 (2022),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学的知识供给》, 《教育研究》第 2 期, 第 83 - 98 页。
- 梁超、王素素 (2020), 《教育公共品配置调整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基于撤点并校的研究》, 《经济研究》第 9 期, 第 138 - 154 页。
- 刘精明 (2006), 《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 ~ 2003》, 《社会》第 3 期, 第 158 - 179 页。
- 刘生龙、周绍杰、胡鞍钢 (2016), 《义务教育法与中国城镇教育回报率: 基于断点回归设计》, 《经济研究》第 2 期, 第 154 - 167 页。
- 吕慈仙 (2018), 《异地高考政策对随迁子女歧视知觉与教育期望的影响——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教育发展研究》第 22 期, 第 37 - 46 页。
- 魏东霞、湛新民 (2018), 《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 (季刊)》第 2 期, 第 549 - 578 页。
- 吴贾、张俊森 (2020), 《随迁子女入学限制、儿童留守与城市劳动力供给》, 《经济研究》第 11 期, 第 138 - 155 页。
- 吴霓、王学男 (2017),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的发展特征》, 《教育研究》第 9 期, 第 4 - 11 页。
- 吴霓、朱富言 (2014),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考试政策分析》, 《教育研究》第 4 期, 第 43 - 52 页。
- 吴要武、赵泉 (2010), 《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 《经济研究》第 9 期, 第 93 - 108 页。
- 吴愈晓 (2013),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 (1978 - 2008)》, 《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第 4 - 21 页。
- 吴愈晓、黄超 (2016),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 第 111 - 134 页。
- 熊春文、陈辉 (2021), 《人口变迁与教育变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社会学思考》, 《教育研究》第 11 期, 第 27 - 35 页。
- 杨东平 (2017),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的发展和政策演变》, 载于杨东平、秦红宇、魏佳羽主编《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1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1 - 20 页。
- 杨娟、宁静馨 (2019), 《以教控人是否有效? ——基于北京、上海两地抬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政策的比较分析》, 《教育与经济》第 1 期, 第 65 - 74 页。

- 殷戈、黄海、黄炜 (2020), 《人力资本的代际外溢性——来自“别人家的父母”的证据》, 《经济学 (季刊)》第 4 期, 第 1491 - 1514 页。
- 尹志超、宋全云、吴雨 (2014),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经济研究》第 4 期, 第 62 - 75 页。
- 张宝歌 (2012), 《回迁儿童: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以生命关怀为基点改善回迁儿童学习适应状况》, 《教育研究》第 2 期, 第 74 - 78 页。
- 张吉鹏、卢冲 (2019),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落户门槛的量化分析》, 《经济学 (季刊)》第 4 期, 第 1509 - 1530 页。
- 张雪、张磊 (2017), 《课外教育支出与学生的教育成果——基于 CFPS 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第 4 期, 第 94 - 108 页。
- 张银锋 (2018), 《异地中、高考政策的区域对比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第 40 - 59 页。
- 张兆曙、陈奇 (2013), 《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第 173 - 196 页。
- 郑力 (2020), 《班级规模会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吗? ——一个基于 CEPS 的实证研究》, 《教育与经济》第 1 期, 第 87 - 96 页。
- Blandin, Adam & Christopher Herrington (2022). Family Heterogeneity,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College Attain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4 (4), 438 - 478.
- Borghans, Lex, Angela Duckworth, James Heckman & Bas Weel (2008). The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Trai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4), 972 - 1059.
- Chen, Yuanyuan, Shuaizhang Feng & Yujie Han (2020). The Effect of Primary School Type on the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8 (2), 325 - 338.
- Clark, Damon & Emilia Bono (2016). The Long-run Effects of Attending an Elite Schoo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8 (1), 150 - 176.
- Cunha, Flavio, James Heckman & Susanne Schennach (2010).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78 (3), 883 - 931.
- Heckman, James, Jora Stixrud & Sergio Urzua (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 Economics, 24 (3), 411 – 482.
- Koo, Anita, Holly Ming & Bill Tsang (2014). The Doubly Disadvantaged: How Return Migrant Students Fail to Access and Deploy Capitals for Academic Success in Rural Schools. *Sociology*, 48 (4), 795 – 811.
- Li, Chengyou, Yong Jiao, Tao Sun & Anran Liu (2021). Alleviatin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rough Land Transfer: Evidence from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69, 101670.
- Lleras, Christy (2008). Do Skills and Behaviors in High School Matter? The Contribution of Noncognitive Factors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Earning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3), 888 – 902.
- Meng, Xin & Chikako Yamauchi (2017). Children of Migrants: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 *Demography*, 54 (5), 1677 – 1714.
- Oster, Emily (2019). Unobservable Selection and Coefficient Stabi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37 (2), 187 – 204.
- Rosenbaum, James (2001). *Beyond College for All: Career Paths for the Forgotten Half*.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
- Sandefur, Gary, Ann Meier & Mary Campbell (2006). Family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Attenda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 (2), 525 – 553.
- Stuart, Bryan (2022). The Long-run Effects of Recessions on Education and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4 (1), 42 – 74.
- Wu, Jia, Xiangdong Wei, Hongliang Zhang & Xiang Zhou (2019). Elite Schools, Magnet Class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5, 143 – 167.

Admission Policy,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Evidence from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Chen Yuanyuan^{1,2}, Song Yang³ & Zou Yueqing³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¹;

Key Laboratory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²;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³)

Abstract: With urbanization reform opening urban schools to migrant children,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high school admission policy for migrant children on their actual enrollment. To perform the policy evalu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to measure the stringency of policy barrier in 72 cities in 2013 – 2016, using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 We find that, migrant children who are facing higher barriers to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have a significantly lower probability of high school admission, regardless of being migrant children or left-behind children. If the policy restriction could be lifted nationwide in 2015, the expected high school enrollment rate of migrant children could increase by 3.63 percen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an enrollment of 127.87 thousand children. Second, the policy impact is much stronger among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low-skilled or rural-*hukou* parents. Thir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barriers have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y also reduce parents' expectations on children and discourage their economic and time investments on children.

Keywords: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for migrant children, migrant children, high school enrollmen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J61, H52, J18

(责任编辑：封永刚)